

現代人論烏托邦

George Kateb 編・孟祥森譯

目錄

導論·····	喬治·凱特布	一
論烏托邦的可能性·····	芙蘭西絲·高爾芬	三
走向更生動的烏托邦·····	芭芭拉·高爾芬	三
自由與對人的控制·····	瑪格麗特·米德	五
效率崇拜·····	斯肯納	七
二十世紀的反烏托邦·····	克利斯多夫·嚴克斯	一〇
烏托邦理想與政治·····	尤金·韋伯	一七
由烏托邦來看社會分析的新方向·····	泰蒙	二三
工電時代的美國·····	拉爾夫·達蘭道夫	二三
機器人與叛徒·····	齊比紐·布里辛斯基	二五
	亞瑟·孟代爾	二九

導論

喬治・凱特布 (George Kateb)

烏托邦是一種令人厭煩的東西。聽聽一位現代大詩人在一首著名的詩中怎麼說：

再無預言騷擾

亦無墳場鬼妖

無金窖

或歌唱之鳥

可爲精神的歸宿依靠

無夢幻南國

亦無遠山如雲棕櫚

像四月的翠綠

一般延續

像她喚醒的鳥雀之回憶

或像翻飛在燕翅上對六月的渴望

一般經久不去[⊙]。

⊙ 華理斯·史蒂文斯，「星期日之晨」Wallace Stevens, "Sunday Morning," in *Harmonium* (rev. ed., New York: Knopf, 1931).

當然，華理斯·史蒂文斯的「星期日之晨」(Sunday Morning)的主題並不是烏托邦，而是另有所指：他指的是一種介於世俗的歡樂和死後的、永不可能出現的「某種不可磨滅的至福」之間的東西，是比安慰猶有過之的安慰與比沒有安慰猶為不如的安慰之間的某種東西。但是，他這首詩卻很可以用來攻擊人世中美好的生活。在這首詩中有一句看似甜美而實為諷刺的句子，「像四月的翠綠一般延續。」四月的翠綠年年來臨；但每次來臨卻落得每次消失；這是一切如蜉蝣般的事物的象徵，而就由於這種瞬時的生滅卻格外美麗。它既美麗又真實，而它的真實卻使得那不真實的、那徒然渴望的、那幻想中的東西變得虛假，沒有價值。天國如此，烏托邦也是如此。史蒂文斯譴責人對死後的幻想，也可以說同樣譴責了追求和構想烏托邦的人士。但這些人士卻實實在在發現到人世所經歷的生活是那樣的令人不滿足，因此夢想着比這個世界好得太多的世界。對他們來說，四月的翠綠還不夠：在他們理想中，他們必要追求和構想更為翠綠的世界。他們努力，歷盡艱辛，而他們的努力與艱辛只獲得這位詩人的責備——感官的享樂當已足夠，而且也確實足夠。幻想中的幸福是欺人之談。

史蒂文斯的這首詩對烏托邦的期望表現着一種久遠的敵意。你可以說，這個世界上的事物太多了，烏托邦沒有容身之地。既然世界上有這麼多事物可以讓我們歌頌，又為什麼要浪費時光來排斥它，而花費力氣去夢想別的世界——而且這另外的世界又像天國一樣可能永不會到來。把幼稚的東西放下吧；長大成人，接受現實，而因此所得的報償亦將是真實而豐碩的。

我們很容易看出，「星期日之晨」的幕後情感是冷硬的。詩人跟世界言歸於好；讓他吃得飽

睡得足的讀者們輕視對美好生活的極端追求，也可能是不錯的。但是那些生活在不幸中的千百萬人民又怎麼辦呢？「四月的翠綠」也可以做他們的麻醉劑嗎？在史蒂文斯的詩中，發言者畢竟只是一個美貌的、有特權的女人。她可能有她的痛苦，但那是由她的富裕閒暇產生的。她不但可以沈溺在美感生活中，甚至她的美感生活是被她的富裕閒暇逼出來的，因為她所有其他的欲望都滿足了。情況設若如此，那麼很好。她已經到達了一個地步，必須由精美的美感來接管。現在她必須講求藝術，以便在她肉體的一切需求都獲得滿足之後，能夠確保樂趣的繼續存在。她事實上已身在烏托邦。然而，她的觀念中卻隱含着另一層意義：千百萬人民都應當留在烏托邦之外。對這些人來說，「四月的翠綠」將是一種替代品，替代小康生活，而不是走向小康生活。爲烏托邦辯護的人卻不得要求每個人都擁有那女主角所擁有的生活條件。他也會反對史蒂文斯的發言人那種反烏托邦立足點。如果要反對烏托邦，那麼先讓世界上每個人都有資格覺得烏托邦令人厭煩吧。

二

如果實現了烏托邦，又會不會是一個騙局呢？聽聽法國劇作家尤金·恩尼斯可（Eugene Ionesco）怎麼說：

在「禿頭女高音」(The Bald Soprano)中，我所企圖描寫的「社會」是完美的社會；我是說，一切社會問題都解決了。不幸的是，這對人的生活並沒有效用。

我的戲所表現的世界是一個一切經濟問題都已成過去的世界，一個不再有神秘的宇宙，一切思想都平平順順的進行（至少就某一部份人類而言是如此）。我毫不懷疑這就是明日世界的境況。……

……我認為，當經濟問題和階級鬭爭結束以後，情況正是如此……我們將會看到，這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事實上我們的問題只是剛剛開始。我們再也無法避免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在地球上幹什麼？而在沒有深沈的目的感之下，我們又如何能够忍受物質世界極端沈重的壓力……

在「禿頭女高音」中，人民再無飢餓，也沒有任何有意識的慾望；他們倦怠欲死。但是這些在無意識中已經疏離的人，甚至連自己的倦怠都不知道。他們只隱隱約約的感覺到它，因此產生了最後的爆發——而這完全是沒有用的，因為那時的人物與處境，都是靜態的，可以互換的，而一切終又恢復其本樣①。

恩尼斯可的論證無法用我們人類已知的經驗加以駁斥。我們人類的經驗有充份的資料使我們相信，若沒有生理上與心理上的許多痛苦，快樂就會失去它的芬芳。甚至可能會喪失它根本的意

① 尤金·恩尼斯可，「尤金·恩尼斯可的世界」"World of Eugene Ionesco"，見西元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紐約時報」戲劇版，第三頁。

義。柏拉圖與約翰·斯圖亞特·米勒等哲學家所說的話，要想加以證實，並不困難：他們說，快樂若想強烈，就需要一些對比，或許是較早時期的某種痛苦，或者是預料中將會發生的痛苦；如果完全沒有這種痛苦做比較，快樂就不可能強烈。設若烏托邦最首要的意義是要消滅痛苦，是否因此就必然會消滅快樂的先決條件？設若如此，我們就可以同意恩尼斯可等人的觀點——他們認為，烏托邦其實不能夠提高人類幸福的一般水準，只是剝奪了人類的體驗。如此說來，烏托邦其實是不是一種騙局？

前面的說法並不是唯一的答案；另外一種答案可以這樣說：即使有恩尼斯可所假定的危險，我們也應該冒險嘗試。即使是快樂——或者至少說，強烈的快樂——在烏托邦中不再是合用的標準，也值得去冒險一試。在剝除了許多的或絕大部份的痛苦根源之後，「快樂」的命運固然成為問題，但另一種巨大的可能性卻會因之而開放。這個可能性恩尼斯可只是隱約的提到，而其他跟他類似的作家卻完全忽視。這種可能性卻由另外兩位政治道德家明白的提出，這兩個人熱情相當，而秉性不同。我所指的是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和諾爾曼·麥勒（Norman Mailer）。

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西班牙內戰之回顧」（Looking Back on the Spanish War）中，歐威爾盛怒的責罵道：

那些政客、教士、文人和牛頭馬面該死的蠻橫，他們竟然厚顏的向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

者宣傳「唯物論」！工人階級所需要的只不過是這些人認為必不可少的、最低的生活程度；沒有這種程度，人的生活就不成其為人的生活。吃得飽，免於失業的恐懼，知道自己的孩子將來能夠得到公平的機會，一天洗一個澡，經常有乾淨的衣服可穿，不致漏水的屋頂，不致太長的工作時間，讓你一天工作下來，還有一小點點的精力⑤。

讓我們注意，歐威爾的想像並沒有飛得多高。他的美好的生活觀念，主要是把那些重大的罪惡消除。他要消除那些從古到今一直存在的「不幸根源」：極端的「不平等」，貧窮，種族與宗教和階級的分別，戰爭和貶抑人性的過度勞役。超乎這些之外的烏托邦想像，是他不關心的。事實上，他反對完全安逸的生活。不管怎麼說，更為積極的烏托邦、更為有雄心的烏托邦所碰到的問題，在歐威爾的烏托邦觀念中也無法避免：當巨大的痛苦都已消除，烏托邦會不會變成一種騙局？歐威爾在說過前面引用的一段話之後，又繼續說了下面一段話，可以說是對這個問題的一種答案：

把全世界都提高到不列顛的生活水準，並不比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戰爭更為艱困。我並不認為這種生活水準的提高可以解決任何問題，而且就我所知，也沒有任何人持着這種看法。我的意思只是說，在人類着手解決真正的問題以前，必須先把貧窮和摧殘人性的勞役消除。我們這個時代最主要的問題是信仰的敗壞：我們不再信仰個人的不朽。可是在

⑤ 喬治·歐威爾，「西班牙戰爭之回顧」（西元一九四三年），收於「論文集」中（George Orwell, "Looking Back on the Spanish War" (1943), in *A Collection of Essay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54), p. 213.

大部份人還像牛馬一般度日，或在秘密警察的威脅下，顫抖與恐怖之中，要想面對這個問題是不可能的……（工人階級）認識到肚子在先，靈魂在後——不是在價值標準上，而是在時間的先後上——這種看法是何等正確④。

這一段的主旨就是，「在人類着手解決真正的問題以前，必須先把貧窮和摧殘人性的勞役消除。」

在歐威爾來說，真正的問題是精神方面的問題。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讓個人獲得此世的不朽。沒有任何我們現在可以想像的東西可以讓入恢復對來世的信仰。我認為歐威爾本人也不可能信仰基督教教義；我也認為他不可能叫別人去相信他自己所不相信的東西，凡是他認為假的，他不可能叫別人去信以為真——不管這種教義是多麼有用。歐威爾是一個自由思想者。在這些假定之下，如何「着手解決人類真正的問題」就變得不够清楚，而歐威爾自己也沒有做明白的指示。顯然，根本沒有解決。死亡就是死亡，或許更充實的生活可以算是類似的解決辦法：或許，要把歐威爾的烏托邦做更進一步的完成，還需要更積極的烏托邦理想來做補充。就如赫伯特·馬古斯（Herbert Marcuse）在「愛慾與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中所說：

死亡可以成爲自由的一種表徵。死亡是必然的，但它的必然性並不排斥最終解放的可能

④ 同前書。

性。就像其他必然性的事物一樣，我們可以把它合理化——使它無痛。人如果知道他所愛者可以免於不幸與湮滅，他將可以死而不帶焦慮。在過了充充實實的一生以後，他可以自己接納死亡——在他自己所選擇的時刻^⑤。

如果這種憧憬能够變為事實，誰還能說烏托邦是騙局呢？

在麥勒的小說「北非海岸」(*Barbary Shore* 一九五一年出版)中，我們可以發現另一種態度，跟恩尼斯可的觀點似乎相合。這本小說的一個角色麥克里奧(Mcleod)這樣說：

我必須承認，某些城市的郊區使我沮喪。在那可惡的午後日光下，克希(Kitsch) * 中的木瓦屋以及所有的那些血污的爸爸媽媽們，推着他們嬰兒車中的小孩。凡是想改革世界的人，都會覺得這個景象是一種可怕的鬼魅。從主觀上來說，我總有這樣一種恐懼：將來我自己就是這個樣子。從客觀上來說，情況更壞。因為，你所有的努力即使是成功，也不過使千百萬不幸的人達到他們現在這種程度，而所謂兄弟愛的世界也只不過是

⑤ 赫伯特·馬古斯，「愛慾與文明」，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Beacon, 1955), pp. 236-237. 另見馬古斯的論文「死亡的意識形態」，收於費弗爾所編之「死亡的意義」中。"The Ideology of Death," in Herman Feifel, ed., *The Meaning of Death* (New York: McGraw-Hill Paperbacks, 1965), pp. 64-76.

* 譯註：大概是貧民區。

臭氣難聞的嬰兒車的世界。一個革命者想要創造一個世界，可是他發現他所創造的世界却是他不能忍受的、他無法在其中生活的，這是革命者的難題⑤。

初看之下，麥克里奧的話似乎像歐威爾所攻擊的那些「政客，教士，文人與牛頭馬面」們所講的話。可是在麥克里奧這段話的背後卻隱含着另一個層面。他繼續說：

你可以說，社會主義的人道作用……是要把人類提升到一個更高的痛苦層面，因為，設若人類必須面對某種悲劇，則不是使他的肚子飢餓，就是使他的心靈飢餓，然而填飽却永不可能⑥。

「填飽永不可能」；可是某些痛苦的方式要比另一些好一點。它們是純粹屬於人類的，而完全是動物性的；它們表露着人的尊嚴——這樣說當然並不很精確，但要把它們說明卻並不容易。藉着麥克里奧的話，麥勒比馬古斯更前進了一步：即使美好的生活也不足以平服心靈——即使我們把死亡擺到一旁不做考慮。麥克里奧事實上等於否定了馬克斯論費爾巴哈的第八論題：「

⑤ 諾曼·麥勒，「北非海岸」，Norman Mailer, *Barbary Shore* (1951) (New York: Grosset's Universal Library, 1936), Chap. 26, p. 249.

⑥ 同前書。

社會生活基本上是實踐性的。在人類的實踐行為和對實踐行為的領會中，一切導致神秘學說的神秘事物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答。」麥克里奧的看法跟馬克斯這種看法正好相反，他認為，最佳的社會現實也不能滿足或窮盡人類的心靈渴求^①。然而，至少可以獲得一些改善，使人類處境更合乎人的尊嚴。如此，烏托邦是不是還能稱做騙局呢？

三

我們已經看到，有些人認為烏托邦的生活是一種騙局。另有一些人認為烏托邦是行屍走肉。讓我們聽聽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達蘭道夫（Dahrendorf）所說的話（見本書第七篇）：

烏托邦跟墳場的不同之處，是烏托邦中偶而還有一些事情發生。……可是……在烏托邦社會中所發生的一切過程都遵循着反反覆覆的模式，是在整體的設計之內發生，同時也是整體設計的一部份……雖然這種社會的某些部份依照預定的，可計算的方式運行，烏

① 卡爾·馬克斯，「費爾巴哈主題」收於卡爾·馬克斯與弗德烈·恩格斯「選集」，第二卷，Karl Marx, "Theses on Feuerbach,"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2 vol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1), vol. II, p. 367.

托邦的整體却永遠留在不動狀態中^①。

達蘭道夫所強調的是烏托邦思想中常常出現的一個特點，那就是烏托邦生活中平靜、無事而固定的狀況。當然，不幸比幸福寫作起來更爲有趣，讀起來也更爲有趣。世界文學便有很大的一部份以人類的不幸和錯誤爲題材；它們描述着人類在面對危機、限制、貧困、必須與掙扎的時候所產生的反應。這些事情似乎構成了生活變化的淵源。人類的不幸，有許多可能是有規則的，有其確定模式的；但不管是否有規則或模式，事實的表象再加上時間的因素卻構成千變萬化、眩惑逼人的景觀。當我們讀到這些故事，會驚恐迷惑，而又深深爲之吸引，爲之蠱惑。跟這種文學相比，那些著名的烏托邦故事中，人的生活便顯然安靜得太多；這對人的想像力真是一種慢待。H·G·威爾斯——最偉大的烏托邦作家之一，或許是柏拉圖以後最偉大的一個——在「現代烏托邦」(*A Modern Utopia*, 一九〇五)中說：

在關於烏托邦的思考中，總是有着僵固和薄弱的結果。它們共同的缺點是空洞。生活中的血性、溫暖與事實，大部份都是缺乏的；在這種思考中，沒有具有個性的個人，而只有一般化了的人民。幾乎在每一個烏托邦中——或許只有莫利斯(Morris)的「無何有

① 拉爾夫·達蘭道夫，「由烏托邦來看社會分析的新方向」，見「美國社會學報」第六十四期 Ralf Dahrendorf, "Out of Utopia: Toward a Reorientation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LXIV (September, 1958), 117.

之鄉的消息」(News from Utopia)是個例外——我們都看到漂亮的但沒有性格的建築物，對稱的和完美的田地、健康、快樂、服裝美麗却没有個性分別的大堆人民^①。

如果我們把達蘭道夫、威爾斯和另外許多人所發的怨言，認為只是出自美感方面的怨言，那就犯了嚴重的錯誤。在他們的怨言中，確實有來自美感的成份，這無可否認。當他們認為烏托邦的故事讀起來無趣的時候，其中甚至也有心腸冷硬的成份。因為，認為生活有趣而加以讚美，往往是忘記了那些使生活有趣的人所經受的痛苦。然而，這並不是全部的重點所在。絕大部份的烏托邦作者都崇尚生活的平靜，然而人類卻有另一種要求，那就是要求改變，這兩種願望之間無法協調。人對於改變的需求是無法避免的，而且在精神上與道德上是必要的。然而幾乎所有的烏托邦設計，都沒有把改變計算在內。烏托邦作家們的共同假定，總是認為當設計一旦實現，就可以以它開始的形式永久的、無限的延長下去。烏托邦思想受着一種「秩序狂」所控制。烏托邦的強烈動因之一，是要使世界盡可能免於混亂，免於失去秩序。烏托邦是一種對於秩序、安靜與平和的夢想。人之所以有這種夢想，是因為歷史的事實過於動蕩不安，可以說烏托邦的夢想是以歷史的夢魘為其背景。同時烏托邦作家們所想像的秩序，就以人類的生活而言，總認為已經是完美的。既然如此，一個思想家如果對於秩序既有狂熱，而對於他所構想的景象又認為已經完美（或

① H. G. 威爾斯，「現代烏托邦」(1904) H. G. Wells, *A Modern Utopia* (1905)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7), p. 9.

接近完美），他當然不情願改變。在他看來，改變就是不完美的象徵，改變必然意謂着不快樂。而從根本上說起，如果一個社會結構已經完美，而卻要從這種完美狀態做改變，則必然變得更壞。因此，若把改變列爲烏托邦結構的一部份，那正好表示了那烏托邦還不是烏托邦，那烏托邦還不够理想。

批評烏托邦的人針對這一點，對烏托邦的構想發出了最強烈的攻擊。但我們必須注意，在烏托邦作品的傳統中，至少有一位作者——還是威爾斯——打破了這個理論結構上的困境。他在「現代烏托邦」第一章開頭的部份這樣說：

在達爾文加速了世界思想之前，人類鑄造了不少的烏托邦和無何有之鄉；現代的夢想者所想像的烏托邦，跟往日的那些構想必然的有一個基本的不同之處。往日的烏托邦和無何有之鄉所描述的都是完美的、靜態的國家，是一勞永逸的快樂與均衡國度，永遠斷絕了事物中所寓含的不安與紊亂。在這些國度中，我們所看到的是健康而單純的人民，在美德與快樂的氣氛中享受着地球的果實，而由同樣美德、快樂的下一代來繼承，如此代代延傳，一直到天地厭倦爲止……但現代的烏托邦却絕不能是靜態的，不變的，絕不能構成一個長久不變的狀態，而必須是一個有希望的狀態，要導向陸續上升的連續狀態①。

① 前書，第五頁。